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十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二一一期 ——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亡灵祭坛】	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 ——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 附：部分黄家人生平简况	李 相
【研究动态】	透过历史的迷障——解读《陈伯达遗稿》	胡 平
【自由论坛】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之一）	常 仁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电邮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亡灵祭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  
——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

• 李 相 •

“大红罗厂南巷20号”，是韩模宁先生永远抹不掉的记忆。33年前，在这里，他前妻一家五口死于红卫兵的木棍，至今不知魂归何处。他们是：前妻黄炜班、前妻的外婆李秀蓉、妈妈陈玉润、弟弟黄瑞五和男佣等五人。

现已年近七十的韩模宁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早年曾生活于苏联国际儿童院，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李鹏委员长的校友，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科技参赞。其父母均在二十年代入党，父亲曾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任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母亲与向警予、蔡畅、帅孟奇是老战友，解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韩模宁现在的妻子邱钟惠，是著名的乒乓国手。笔者在采写另一篇文章时，韩模宁先生说正准备打一场房产官司——“文革”中他前妻黄炜班家的房产被强占，至今没有完全收回。为了这场官司，韩模宁先生不得不讲述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世的黄家人也满足了笔者的要求，打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 ◇ 大红罗厂南巷20号

大红罗厂南巷20号，是黄家的私房院落，是5人惨死的发生地点。

大红罗厂这条胡同东西走向，长不过三四百米。坐落于北京西城西四的北面，林彪宅邸毛家湾的南面，程砚秋故居所在的报子胡同东面，国防部以及北大医院的西面。而“南巷”是在大红罗厂中间朝南走向的一条小胡同。“20号”在南巷东侧的最南头。这是个收拾得颇为雅洁的二进院，是黄家外婆李秀蓉于1952年花一万余元购置的。因为老人只有陈玉润这一个女儿，“文革”前她与女儿一家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也是一个热爱党、有觉悟的家庭，为了帮助社会缓解住房紧张的现象，他们认为自己住的比较宽裕，“文革”前几年，将东厢房的其中两间租给了海军某部的姜某一家。

# ◇ 惨剧始于所谓“转移财产”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破四旧”进入了疯狂阶段，死人的事不断发生，“红色恐怖”笼罩京城，但黄家还未感到威胁的来临，更未意识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因为尽管他们是有保姆有男佣有房产的“大户”，但从1952年住到这里以后的十来年里，始终安分守己，从不张狂，与街坊四邻相处很好；并且家里有党员有军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内心坦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还不至于造到自己头上。

然而，一件不经意的事，竟引来了杀身之祸。

8月26日，也就是黄家遭受血腥毒打的前两天，黄家的儿媳汪克宽从供职的东方歌舞团赶回家。她要找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因为她们单位的红卫兵也在破“四旧”，她必须表现“积极”一些，完成“破四旧”的任务。她从家里找出了一些唱片、乐谱、香水和一条假珍珠链装在一个大书包里。不巧的是，汪克宽出门时正碰上租住她家的姜某的父亲，姜老头厉声叫住她，问书包里是什么，并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准转移财产。汪克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们单位红卫兵也在‘破四旧’，这些东西是准备交给单位红卫兵的。”汪克宽边作解释边返回院中，恰好碰上了姜老头上小学的孙女，她急忙叫住了小女孩，说：“小姜江，你看看阿姨包里的几样东西。”那个10多岁的小女孩往包里看了一眼，只是莫名其妙地“哦”了一声。她并不明白汪克宽这位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的阿姨做出此举的目的，汪克宽是想借这个孩子的口告诉她爷爷：包里并没有什么“财产”，以解除姜老头的怀疑。因要赶回单位，汪克宽乘姜老头不注意，还是于当天匆匆离开了家。

汪克宽196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在东方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

。其实她平时每天都回家住，只是因忙于给单位紧张的运动作记录，天天忙到很晚，也是为了表现积极，她这几天一直住在单位的宿舍。直到27日，她意外地接到丈夫黄瑞五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汪克宽丈夫黄瑞五的工作单位在靠近通县的管庄，当时是离北京市内较远的地方，他平时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但恰巧28日这天单位组织参观学大庆展览，为不误参观学习，黄瑞五在27日回到了家里。

黄瑞五问家里衣柜的钥匙是否在汪克宽手里。“是在我手里。什么事？”“他们（红卫兵）来了，柜子锁着，打不开不太好。你还记不记得我保存的子弹壳？”“记得，是步枪子弹壳。”“那你赶紧回家，把钥匙送回来。”前一天才离开家的汪克宽怎么也没有想到，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所谓她“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给了辖区派出所的片警罗××。罗××第二天（27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读的弟弟率红卫兵来抄黄家。

当汪克宽从位于和平里的东方歌舞团赶回家时，家里已经被抄得七零八落，全部物品都被封存起来，一家人也都被集中在她与黄瑞五平时住的屋里。她看到大姑姐黄炜班（韩模宁前妻）也在场时，不禁吃了一惊，因为黄炜班、韩模宁夫妇有住房，平时不住在这里。汪克宽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他们把我叫回来的，不能随便离开。”黄炜班无奈但又很坦然地回答着弟妹。原来，红卫兵来抄家的前一天，姜老头让小孙女把黄炜班从她的工作单位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叫了回来。之后红卫兵命令，黄家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凡是已进了院子的都不能擅自离开。

虽然红卫兵命令森严，但在黄家人集中的屋子里并没有红卫兵把守，看管得也并不是很严。汪克宽默默地扫视了一遍家人，将目光落在了丈夫黄瑞五的身上，似在对爱人说，又似在自言自语：“我在单位还有任务，走不开，我得回去。”“你回来了，走了就不好。”黄瑞五提醒妻子。“家里这种情况也没地方住，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吧。”说完，汪克宽匆匆离去。可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留给爱人和其他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8月28日，红卫兵血洗黄家。

#### ◇ 在红卫兵毒打后的死亡

这一天，在罗××带领下红卫兵继续抄家。黄瑞五把衣柜钥匙交给了他们，他们搜出了几粒子弹壳。这几粒子弹壳是黄瑞五小时候随父母在开滦煤矿居住时捡到的。那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战争过后，随处都有战斗的痕迹，收集几个子弹壳十分容易。黄瑞五也无法摆脱男孩子的天性，他捡到子弹壳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红卫兵命令黄瑞五交待子弹的来历，他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信他的“谎言”，首先对其进行抽打，血腥由此开始。

抽打“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转移对象，叫出了随黄家生活12年、当时三十几岁的独身男佣。男佣出身不好，派出所是掌握的。本来“文革”一开始，黄家就想把他辞退，但不巧他出了车祸，他们本想等他养好伤，再让他出门。而恰恰是男佣的出身给红卫兵们找到了借口，红卫兵的逻辑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变天”；现在又搜出了“子弹”，有“子弹”就必然有枪。红卫兵“顺理成章”地审问男佣。一个老实巴交的独身男人，到哪里去找枪，无情的皮带、木棍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黄瑞五和男佣都正直，内向，不会撒谎，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在红卫兵的

淫威下，也不可能保护自己，“负隅顽抗”的两个人被红卫兵打倒在地。黄家的三代女人黄炜班、陈玉润、李秀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倒地“呻吟”，她们的心在流血，但又无能为力，甚至连一滴眼泪都不敢掉！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给这三个女人扣上了“窝藏逃亡地主”的罪名。此时的红卫兵不知是打累了，还是想看看亲人打亲人是什么滋味，他们命令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话激怒了红卫兵：“不打你妈，我们就打你！”他们一边骂一边抽打黄炜班。

8月份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黄家人在烈日下惨遭红卫兵毒打，衣服打飞了，几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他们呻吟着要水喝，红卫兵倒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正是这一“要求”加速了死亡的到来。当天，黄炜班、黄瑞五和男佣相继停止了呼吸。两天以后，黄母陈玉润死去。陈玉润死前，曾给远在浙江部队的大女儿黄炜孟寄出一封只有6个字的短信：“我已无处可去。”可怜的是，信佛而常年吃素、视杀生为罪恶的李秀蓉老人，亲见外孙子、外孙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几天以后，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也受惊吓而死。

在场的黄家人幸免于这场劫难的只有黄瑞五和汪克宽的惟一幼子，年仅两岁。是黄家六十多岁的老保姆保全了黄家的这一骨肉。就在红卫兵疯狂毒打黄瑞五等人时，保姆一直抱着孩子跪在院子里，不敢抬头也不忍抬头，她虽然不断地变换姿势，但双眼从未离开过紧紧抱在怀中的孩子，生怕谁把孩子夺走。

终于轮到红卫兵审问她了，一句“下中农出身”的回答救了保姆，红卫兵让她站起来。乘解脱之机，保姆抱着孩子悄悄溜出家门，跑到东方歌舞团，把孩子交给了汪克宽，并诉说了家里的遭遇。

当汪克宽和黄炜班的丈夫韩模宁知道变故后，现场已经被红卫兵处理，他们连亲人的骨灰也没见到，更不用说遗体了。33年过去了，黄家尚在的人仍不知道屈死的亲人魂归何方！

#### ◇ 悲伤绵绵仍未消

黄炜孟接到“我已无处可去”的信后，感到莫名其妙，“父亲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母亲、姥姥也没有问题，弟弟黄瑞五没有问题，妹妹黄炜班更不会有问题……”她宽慰着自己，但隐隐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犹豫中没敢给家里回信。

黄炜孟的丈夫胡家俊和妻子在同一个部队，他背着妻子给岳母回了封信，意思是老人可以到他们那里住。信发出后，其实黄母已经命归黄泉，红卫兵将信截获，寄回了部队，胡家俊因“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了批判。

几天后，韩模宁给黄炜孟寄去一信，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而他们也只能躲在门窗紧闭的家里暗自流泪，思念亲人。同时，还要把来信上交组织，以此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

在韩模宁给黄炜孟写信的同时，汪克宽因为原在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与家人同住，衣物等生活用品都不在身边，特别是2岁的儿子吵着要他的小暖瓶，不得不找到设在离家不远的小拐棒胡同的红卫兵办公室。几个红卫兵告诉她：“他们（指黄瑞五、黄炜班和男佣）都是反革命，有枪有子弹，都被我们用木棍打死了。”“他们既然是反革命，我支持革命行动。”面对稚气未脱还只能算是孩子且又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汪克宽只能违心地这样说。那一刻，她想的更多的是为了可怜的幼子，她还得活下去。

经过红卫兵的允许，汪克宽回家取衣物，又碰上姜老头，被告知去派出所迁户口。在派出所，片警罗××接待了她。因为罗××清楚抄黄家的全过程，汪克宽为了核实情况，问到：“我们家抄出的是什么枪？”“没那回事。”“红卫兵说几个人是他们打死的。”“没那回事。”这个让红卫兵头目即自己的弟弟带人来抄家、并打死几条人命的警察完全否定了红卫兵的话。

汪克宽进一步到北京市三十八中学核实情况。那里的红卫兵说：“大红罗厂一带本来不归我们管，因为有人来通知说有人在转移贵重物品，并且叫我们去，我们才去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的黄家，经过8月28日红卫兵的血洗，丢掉了5条人命，全部家当被抄。韩模宁找到片警罗××，想要回妻子黄炜班生前带的手表，那是朱德送给女儿朱敏、朱敏又转送给韩模宁的，此表对韩模宁的意义不同一般。但罗××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不久，黄家被从大红罗厂南巷彻底“扫地出门”。姜某一家由厢房搬进了宽敞的北房。后来由房管所安排，又搬进了4户人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黄家活着的人感到为亲人昭雪的机会到了。为核实情况，他们找到姜某所在的海军机关。有关人员接待他们说：“姜某得了一种病，已经丧失记忆，过去的事都忘光了。”他们又找到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针对追究凶手和指使人的责任说：“这是当时依照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现这种事。”他们给胡耀邦同志写过信，也找过中组部、侨联、北京市委，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对黄家的遭遇都很同情和重视，分别有过指示。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帅孟奇、章蕴都亲自过问。黄家死去的亲人当然都有了“结论”，但他们要的仅仅是一纸“结论”吗？

采访中，韩模宁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在身边的黄炜班的照片，久久地注视着；黄炜孟说起自己死去的亲人时，尽管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仍然禁不住泪流满面；汪克宽在丈夫黄瑞五死后的日子里，曾有两个月失去记忆，她常常梦中惊醒，此后身体一直不好，她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了一个小时。末了，她抱歉而又悲伤地说：“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从大量的事实中，黄家人始终认为，片警罗××是始作俑者，他是5人惨死的元凶。但他们不知道，在有生之年，历史还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亲人们的冤魂能不能得到安息？

□ 原载《南方周末》

∞ ∞ ∞ ∞ ∞ ∞ ∞ ∞ ∞ ∞

附： 部分黄家人生平简况

黄家男主人：黄国聪，广东中山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英文，抗战期间任教于西南联大。后到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做英文翻译。1950年携全家定居北京。1965年病逝。

黄家女主人：陈玉润，曾就读于唐山的孔德女中，当过小学教员。随丈夫黄国聪到北京后，没再工作。1966年8月28日被红卫兵殴打，于30日死亡。

黄福麟，黄国聪和陈玉润的长子。1948年辅仁大学毕业后到香港谋事。每当想起亲人的惨死，他都夜不能寐。90年代迁居加拿大，尽管家人多次写信告诉他，国家已经改革开放，盼望他回来看看，可他仍然不回。“当我踏进大红罗厂南

巷 2 0 号时，我会是什么心情！”

黄瑞五，次子，6 0 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分配到建材部玻璃设计院。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视工作如生命，一心钻研业务。死时才三十几岁。

黄炜班，长女。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医附属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兼党支部书记。早在 1 9 5 0 年上高中时，她就入了党。有一年她到京郊巡回医疗，把一位患重病的农妇接到父母家中，吃住好几天，再陪她到附属平安医院就医。农妇病好后感激涕零，黄炜班却认为自己有这个条件，此事实属太平常。在家人的记忆中，年年除夕她都在医院值班中度过，而让其他同事回家团聚。她留下了一对当时不满 3 岁和 5 岁的儿女。

黄炜孟，次女。在北平的贝满女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大学。于 1 9 5 0 年报名参加志愿军，结果被分到四川江津的防化兵学校。1 9 5 3 年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深造，1 9 5 7 年学成后又回到防化兵学校。1 9 6 6 年，当她得知亲人们的噩耗时，强忍悲痛，不敢有丝毫流露。1 9 7 6 年和同在一个学校的丈夫一起转业回到北京。

□ 摘自《南方周末》

~~~~~

【研究动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透过历史的迷障——解读《陈伯达遗稿》

• 胡 平 •

在苏联有过这样一个政治笑话：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了党书记彼得罗夫；另一个人说，我因为支持了彼得罗夫，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

在中国也有同类的笑话。讲的是某些倒霉的中共干部，在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指挥下被揪出来，打成反党黑帮；后来刘少奇被打倒，这位干部又被说成是刘少奇黑司令部的爪牙；林彪爆炸后，他被扣上林彪反党集团别动队的罪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又被归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最后，华国锋登基，四人帮垮台，但是他依然不得翻身，这次，他又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同伙了。

读《陈伯达遗稿》，使人想到这两个笑话。

### ◇ 文革的第一手资料

由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整理、编辑、注释的《陈伯达遗稿》，很值得一读，因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若干内幕。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 9 9 8）一书收录了陈伯达在生命最后十年（陈伯达死于 1 9 8 9 年 9 月）在监狱中所写的文稿，共五十七篇，按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自述，主要是对自己经历过三与过的一些事情的回忆、辩解或说明；另一部分是学术文章，涉及文艺评论、哲学和经济学。

陈伯达是中共著名理论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六六年十二月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在名义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号

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在七零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陈整风”，从此陈伯达消失于政坛。

在我的记忆中，陈伯达的垮台并未引起什么震动，因为早在六八年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就已经不像运动前期那般显赫了，而陈伯达的淡出还要来得更早一些。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无疑是文革的主犯之一，但如果要问起我们老三届这批人对陈伯达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倒是陈伯达在六六年十月下旬所作的题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内部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伯达对横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严加批判，指其为“反动的血统论”。

照我看来，《陈伯达遗稿》中的自述部分最有认真研读的价值。这些文字是陈伯达以戴罪之身在监狱里写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四人帮已经垮台，文革已经被否定，整个政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文革中，以至文革前所定下的各种案件，包括某些由“伟大领袖”亲手下定的案件，此时似乎都有了重新审理的可能。陈伯达认为自己其实是文革中一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当初给他安上的那些罪名，有的是莫须有（如“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有的已经过期作废（如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过去是可怕的罪名，现在却成了“正确路线”），他或许不敢有翻案的非非之想，但很可能抱有希望得到从宽处理的侥幸心理，至少也想把一些问题说清楚，所以才写下这些自述自辩的文字。

#### ◇ 历史的复杂性和写作的隐晦性

陈伯达想为自己辩解，这就要求他必须坦率地讲出有关的事实真相。既然陈伯达已经被整了十来年，罪状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罪名已经大得不能再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讲出全部事实真相，几乎已经不可能再对自己增加什么危害，倒有可能反过来减轻自己的罪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假定，落到这一步田地的陈伯达是很愿意实事求是的。然而问题在于，因为陈伯达一度位于权力核心，其所作所为都和其他大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关联，而这些大人物至今还供在神龛上冒犯不得。这就使得他在讲真话时不得不有很多顾忌。换句话说，陈伯达这些自述的问题，倒不是有多少话讲得不真实，而是有多少真话没敢讲出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雷区。

比如说，一方面，他必须让主事者知道他做的有些事其实是奉了毛泽东的旨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让主事者认为他在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毕竟，中共当局没有像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当局还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维护毛泽东。这意味着陈伯达这个替罪羊的角色还得继续当下去。此外，陈伯达做的有些事情还和周恩来、还和邓小平等人物有关联，这些关联该说不该说，该说到什么程度，都是很不好把握的。更何况陈伯达系狱多年，对外界的情况了解有限，摸不准当政诸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他的自述，每到节骨眼的地方，往往是含糊其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除了小圈子里的极少数人看得懂以外，别人想来都读不明白。一部涉及中共高层秘辛的书，读起来十分沉闷，乍一看去也没有爆出任何惊人内幕。这也是无奈的事。

伯达有子。我以为，陈晓农之所以要把他父亲的遗稿整理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给世人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陈伯达洗去若干不白之冤。

在书前的说明和书中的注解里，陈晓农引述陈伯达的话——“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5页）。陈伯达还说过，对运动中的事，他持忍辱为党，忍辱为国的原则，承担一切责任

，不牵连其他人。对无法说明和有可能牵连他人的事，他只能以“自己发疯了，精神错乱了”一类话来解释（161页）。这就是说，凡当陈伯达声称“发疯”、“精神错乱”之处，必涉及最高层不可告人之玄机。

为了让读者尽可能地理解陈伯达自述中的难言之隐，陈晓农写下了大量的注解。可是陈晓农既然还生活在那个制度之下，他也很难把话都说明说透。即便如此自我审查，《陈伯达遗稿》还是不能在国内出版而只能在海外出版，这本身也说明有关陈伯达的问题在目前的大陆还是一个在政治上敏感、犯忌讳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格外需要我们认真解读细心研究。

# ◇ 陈伯达是怎样垮台的？

现在我们大体可以认定，陈伯达和林彪与四人帮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陈伯达与四人帮——其实主要是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六六年八、九月间，陈伯达因病住院休息，对来探望者讲到江青的飞扬拔扈，触怒了江青，病还没好就被江青叫关锋要他出院（82页）。在六七年二月初，毛泽东在内部批评中央文革，批评陈伯达、江青，陈伯达感到压力很大，向别人抱怨江青太霸道，说他受不了要自杀（三见王力回忆录）。尔后很长一段时期陈伯达都不如先前活跃，看来也主要是江青的关系。陈伯达在九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曾对陈说：“我没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114页），可见其地位早已不稳。九大后，林彪一派与四人帮争权夺势，矛盾激化，陈伯达自然容易站到林彪一边。

按照陈的自述，在庐山会议之初，陈伯达还并没有加入林彪阵营。庐山会议前，陈伯达感觉到林彪与江青正在暗中较劲，于是，陈向毛请示并向周报告，“到华北各地看看”，事后还向毛和中央写了报告。从这段叙述的口气看，陈在初期还没有公开介入林江之争，甚至还有意回避。

在庐山大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与毛谈话，时间并不很短，然后大会开了，原定康生先做报告，但林彪抢先讲话，提到天才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议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118页）。再以后，才发生了军委办事组请陈伯达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语录的事，陈答应了。在自述里，陈伯达对他答应找语录一事很后悔。为了表明他最初并无此意图，他特地讲到上庐山来时只带了列宁选集，还是托别人临时从山上才找到马恩斯的书。

由此可见，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帮忙鼓吹天才论，不但没有针对毛泽东之意，而且还是在误以为毛泽东本人认可天才论之后才放言鼓吹的。

这里有个小插曲，在九大闭幕后修改宪法的内部讨论会上，林彪手下干将吴法宪曾就天才问题和张春桥发生争吵，“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所以他发火了”。如此说来，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帮助鼓吹天才论，一来是他本来就赞成，二来也是因为他想借机打击张春桥，压一压江青。陈伯达当然知道江青是倒不了的，不过趁势压一压她的风头倒不是没可能。

庐山会议上，林彪开了头炮，陈伯达在华北小组的会上表态拥护林彪讲话，接下来发言附和者想很多。“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作成了简报，对所指的人没有言明，但措辞尖锐”（136页）。“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像是汪东兴说的”（118页）。江青、康生读到华北小组简报，有



些恐慌，先找到毛告状。然后一干人等在毛那里开会，但江、张未到，因为他们“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应是指汪东兴——引者注），也没有事”（121页）。

林彪享有九大党章明文规定的正式接班人的地位，鼓吹毛泽东是伟大天才的论调又不是什么新口号，而且正是林彪的注册专利，长期得到毛的默认以至鼓励，所以很容易得到与会者的附和，少数知内情者知道是在向四人帮发难，故而跳得很起劲，因此把四人帮搞得相当被动。对于这种局面，毛想来十分恼火，所以他后来指斥林彪“搞突然袭击”。毛知道四人帮在党内根基尚浅，不受欢迎，但他唯恐林彪一派借此事件势力更加膨胀，所以采取了保四人帮抑制林彪的态度，可是在当时，毛还不能一下打倒林彪。于是毛一方面稳住林彪，他在那篇《我的一点意见》（有人称之为毛在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特意强调“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则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这样，陈伯达垮台了。

毛泽东明打陈伯达，暗压林彪。林彪与四人帮的矛盾遂转化为与毛的矛盾。这是庐山会议的后遗症。

#### ◇ 文革中的“刘盆子”

从陈伯达自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情况。

关于汪东兴，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参与打压四人帮的行动，可见彼此间结怨甚深，后来他参与逮捕四人帮一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何以偏偏放过了汪？你说是因为汪东兴，“反戈一击有力”吗？以毛的猜忌心，为何直到临终不曾除掉汪，还交托重任？

张春桥为什么早在九大后修宪讨论时就明确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这种观点（这当然不是否认毛的伟大，而是否认毛的伟大来自天生，强调来自实践）？看来，张春桥对林彪也早有不满，或者说意识到九大后林彪势力膨胀对毛构成威胁，而这种意识或者出于先意承旨的心理，或者可能来自江青，甚至直接来自毛。

当然，我们从陈伯达自述中可以了解最多的还是陈伯达本人。虽然在表面上，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实际上的处境却可怜得很，正如他私下所说，在中央文革里，他只不过是刘盆子，是傀儡而已（参见王力回忆录）。这很可能正是毛的本意，毕竟，毛不大好让自己的老婆直接出面当中央文革的第一把手。刘盆子的命运就是先给别人当傀儡，然后再给抛弃。陈伯达以刘盆子自比，看来他早就预感到自己下场不妙。

也许，陈伯达从一开始就知道文革小组组长一职不是什么好差事，所以在起初，周恩来向陈伯达提出担任文革组长时（陈以为周是奉毛之命），陈一连三次推辞不受，周发重话：“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陈只好接受。陈奉周之命提出文革小组名单，完全是推测毛的意图。其后，陈又直接向毛表示自己是“书生”，不胜任，毛要他把“书生”二字去掉，于是，陈只好就任。上任不久就与江青发生矛盾，陈也曾设法对江青略加约束，其效果可想而知。以后，毛多次表示他不信任陈，“并和一些同志打过招呼”（见中共批陈整风时的文件）。“从六七年以后，中央一些重要事情并未按常规通过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陈晓农注，97页）。可见陈失势已久，再到最后干脆打倒了事。

#### ◇ 共产党的权力—话语系统

陈在一处写道：“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上批判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我的无原则性，也说明了我不能割舍一个虚假的名位”（139页）。这恐怕话中有话，主要还是想表白自己在文革小组中只是担虚名，并没干什么事。

说到辞职，共产党的职是想辞就能辞的么？陈伯达当初还只是不想接受文革组长一职，就招来了“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的指责，若是当上后又提出辞职，岂不成了“分裂党”、“向党示威”、“向党罢工”、“向党抗议”了吗？赵紫阳可是辞职的，下场如何呢？何况那还是二十年之后，还是党重新变得“伟大光荣正确”之后的事情。

共产党有如黑社会。在共产党那里，入党、当官固然不易，退党、辞职同样很难。想来想去，大概只有以健康为由辞职或许安全一点，但也未必，如果党不体谅，大帽子也是现成的——“党员的身体生命都是属于党的，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却只顾保命而不肯革命，该当何罪？”

福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其实，权力也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在共产党的权力一话语系统里，领导永远正确，永远能用一套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说法把你套得牢牢的。

#### ◇ 一出尚未终场的荒诞剧

陈伯达是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当年的罪名几乎全成了讽刺。在八零年十一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公审”中，陈伯达又被定上若干新的罪名，其中一条是“反革命煽动罪”，并举出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例证。

对此，陈晓农忍不住装傻提出“疑问”，在编者注里写到陈伯达是五月三十一日被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当时毛不在京）派进人民日报的，从时间上也来不及主持撰写这篇社论，他只是审定了文章并将原标题改为现标题而已。陈晓农问到：“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最卓越、最有责任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说对于六月一日社论的反革命性质没有识别力和判断力，作为中央常委，不能说对于中央机关报上出现公开的反革命煽动没有制止与纠正的责任和力量”，“这该如何解释呢？”（163—166页）

答案是很清楚的。记得在当初“公审”时，北大正在展开竞选活动，不少同学就对这场“公审”的公开性、公正性以及若干结论提出严肃质疑。这一代大学生饱受文革之苦，坚决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文革的领导者——首先是毛泽东，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罪责必须追究。但是，中共的所谓“公审”与定罪，由于它违背法治，在若干问题上也违背事实，因此也必须批判。如果说文革是一场荒诞剧，那么，可悲的是，这场荒诞剧至今尚未终场谢幕。

陈伯达作为文革的重要角色，他的回忆录是有研究价值的。对了，据中共官方消息，江青在狱中也写有回忆录，但在“自杀”前“自己”全部销毁了。你相信吗？

□ 原载《中国之春》2000年2月号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之一）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文革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所具有的共同政治特征、产生条件和受迫害经历，作为客观审视和重新研究认识文革的新视角。文章具体分析了文革时期“革”与“保”的对立和斗争，同时也指出了被许多研究文革学者所忽视的支左部队和新老保守派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全盘否定文革造反派的五大害处：一、削弱了民众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二、放弃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激化了社会矛盾。三、片面强调法治，使中国陷入了一个由司法腐败制约破坏“法治”建设的怪圈。四、削弱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把扩大两极分化作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五、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攻击武器。第三部分依据对文革历史的重新认识，指出十种对象应该就他们在文革中起的作用和表现忏悔。按照民主的平等原则，对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由互联网带来的网络讨论声音予以同等重视和摘引，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

在流行的文革评论语系中，被视为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因帮助党开门整风而遭迫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似乎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按流行观点，文革造反派追随“四人帮”篡党夺权、为非作歹，代表了一股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反动落后势力。有人在提起上海工人造反派作为全国造反派典型代表时，是这样描述的：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破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上的失误。”〔1〕

以揭批文革为主题的电影《芙蓉镇》中那个打着破锣高喊“运动喽”的造反派疯子，更是成了许多非文革亲历者脑中的“定格”形像。这种以偏概全、歪曲历史的做法，也影响到当今互联网讨论者的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阁下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错在于打击的对象搞错了。对于长期跟随其闹革命的老同志不信任，却去相信具有野心的所谓左派，文化大革命不搞成一团糟才怪呢。所谓的左派，为了个人野心，鼓励造反派胡作非为，将文化大革命变成枪炮大战场……。”〔2〕

而无论是在学术论著和文章中，还是大量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除了个别人被认为带有兴风作浪、图谋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嫌疑之外），却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可以想见的了。”〔3〕

但是在实际上，只要人们尊重历史，正视事实，就不难从以下三个方面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

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一、造反派与右派具有共同的社会产生根源

对于一九五七年从动员知识分子帮助中共“开门整风”发展到反右运动及而后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存在着不同观点。根据《我眼中的文革》〔4〕的看法：当时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文革的最初的想法，来源于延安时期，当时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就向毛泽东提过一个周期理论，那就是，历史上，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是欣欣向荣，统治阶级开明，善于纳谏，严于律己，但后来却都因为贪污腐败而衰败下去，周而复始，共产党执政后应该怎么打破这个周期呢？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生……反右之初，毛泽东提出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是真诚的，他希望党外人士能监督执政党，从而促使党内的反官僚主义。他的这个想法，在党内受到了很大阻力……而到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加上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矛头一转，开始反右，改造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次运动使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转向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反右并不像现在宣传的那样，是阴谋，而是像毛泽东讲的那样——阳谋。反右和文革的起因，也是因为这个周期论。六四，六五年的时候，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日趋严重，大家如果读过《红墙内外》这本书，就该知道，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卫士，后来分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工作，在那里见识到了惊心动魄的腐败景象（当然今天来说算不了什么），劳改队的头头把犯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伺候自己，如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打击报复，这位卫士把这些事后来全报告了毛泽东，可想而知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这不是毛泽东想要建立的中国，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官僚和腐败，只有从下至上发动一场革命，而他本人当时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个人威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按照这位网络思想传播者的观点，毛泽东在五七年鼓励的鸣放和六六年发动的文革，期间显然贯穿着一条用扩大人民民主方法来防治执政党变质腐败的主线。当代政论家王山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见解。〔5〕

如果审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下列重要想法，上述观点即使不完全正确，却似乎包含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历史逻辑：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6〕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7〕

对反右和文革运动的另一类观点则强调，毛泽东说过，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这个“两家争鸣”论点，实质上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

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主张，“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般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再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判断鼓励“大鸣大放”是用“引蛇出洞”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蓄意进行打击。似乎也不过份。（8）

按这种分析观点，毛泽东根据反右事件所引发的左倾思想，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反右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才在文革中进一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

上述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的共通之处是：受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内在规定和影响，在一九五七年参加“鸣放”的中国右派分子与一九六六年投入造反的人士中，显然都存在着对中共现存制度的某种不满或反抗心理；前者可解释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自然延伸，后者可理解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说造反派是以“左”的形式来反抗现实，那么右派也许是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现实”。而促使他们反抗行为的共同因素，显然是同样的所谓“干群矛盾”；只要这种矛盾存在一天并获得合适的气候条件，就会有右派、造反派之类的社会不满分子，出来质疑、批评甚至挑战中共（主要是基层组织）的统治权威。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点，仅在于对这种不满和反抗心理的产生原因作出了不同解释：前者强调毛泽东把矛盾的症结归终于中共自身的腐败倾向，后者则强调毛泽东试图在中共敌对分子那里寻找矛盾根源。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跟把右派和造反派放在对立位置的流行做法相左，右派与造反派面对共同的社会矛盾产生共同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却是两种观点所揭示的共同事实。

## 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右派”身份

右派和造反派的共同点，突出反映在许多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所具有的“右派”身份上。实际上，文革运动初期所开展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乃是全国各地文革造反派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作者刘国凯的回忆：这一运动“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当时在全国各地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干扰”运动，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和召开斗争大会。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作为基本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爆发，激进学生的行动（亦有学生从右的方

面攻击党）就其主流而言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说把北京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因，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随之在全国全面铺开的“在无辜群众中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演。……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当时的《广州日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按档案材料把一般报社工作人员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象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后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厄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9）

如果说，刘国凯所披露材料反映了全国各地的“二次反右”运动概况，箫羽在《我眼中的文革》一文中，则披露了上述运动怎样促使这些打击对象成为造反派的动机和心情：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得津津有味，而后说此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我爸说各地情况不同，上海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较宽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是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批人也很快就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他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斗，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说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人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10）

文革造反派与前右派之间的政治血缘联系，更反映在有相当数量的右派、“摘帽右派”或“内定右派”分子，直接参加了造反派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遇罗克兄弟遇罗文所作的文革历史回忆，首都中学造反红卫兵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11）

在湖北著名造反派组织“北斗星学会”成立之际，在“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而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更是清楚地表现出了学会成员对这场文革运动进行独立思考的渴望与实践。（12）

在幼河所著《士可杀，不可辱》一文中，作者对右派与文革造反派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了如下翔实描述：

“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反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13）

而在本人家乡的文革运动中，右派分子或“内定右派”参与造反派活动的情形，也比比皆是。本人老家邻居一个被称之为“尤同志”的前房客，在他搬走之前常向我们这些小孩吹嘘他随军南下当小兵的革命经历。直到支左部队在“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期间，有人看到他挂着牌子在示众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妄图翻天的老右派。本人最早工作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时期，组织上就兜出了一名造反派清查对象是五七年“内定右派”的底细。这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打击迫害右派”的流行说法和各类文艺作品故事，存在着明显的抵触矛盾之处。

### 三、文革造反派遭遇了比右派更深的迫害和灾难

对于文革初期造反派受迫害的原因，一篇署名“胡思之”的网络文章这样说道：“只要稍有些岁数的人都知道，文革之前，莫说对中央领导评头品足，即使对单位支部书记说些不满的话，也有坐牢的可能。有许多反党分子其实所反的只是单位中的头头，对共产党政府的领导根本就不敢反，但却被扣以反党分子帽子。”（14）

上述情况显然同反右运动时的情况毫无两致。对于造反派文革初期的处境，著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写过这样一段控诉文字：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要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

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15）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受迫害的主要原因，跟他们的“出身不好”有密切关系。而就在“第二次反右运动”开展的同时，另一场以“黑六类”（16）（不少造反派都属于这类家庭）为斗争目标的“红色恐怖运动”，由北京市中学“血统论红卫兵”组织带头，在全国卷起了狂潮。刘国凯对此作出了如下描述：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在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直接号召下，只短短一个星期左右，‘破四旧’就在迅速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体的‘红色恐怖运动’。‘血统论’以‘鬼见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而把自己残暴行动的目标，对准了所谓的‘黑六类’分子。‘红色恐怖’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这类暴行令人发指的后果是。在‘红色恐怖运动’中仅北京就有1，700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六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抄‘黑六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血统论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体壮的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赶往黄泉之路。‘血统论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像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血统论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六类都打死才好！’”（17）

尽管我们缺乏具体统计数字，来证实上述这类暴行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许多“出身不好”者参加了造反派的队伍——换句话说，有多少造反派的家庭在文革一开始



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我们可以从“清华四一四思潮”人士对造反派总体情况的分析评介，找到可以追寻的线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四一四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18〕

上述结论，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文革初期相当部分造反派的“不良”家庭成份及其政治影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情况而言，造反派在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夺权”的短暂欢欣胜利之后，随即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中，受到了“支左”部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与他们因“不良”出身成员太多而得不到解放军的信任，显然有很大关系。以本人家乡江苏省无锡市为例，全市最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被打成反动组织，该组织以及“毛泽东主义”造反红卫兵内部，大批“出身不好”或有右派分子、“四清下台干部”等历史污点的“坏头头”，或被关进监狱，或在本单位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据有关文章披露，在同一时期，仅四川一省便逮捕了数万名造反派成员。〔19〕在全国各地，驻军开枪射杀造反派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经过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新一轮对造反派的“平反浪潮”，经过七、八月份的重整旗鼓和大武斗，到九、十月份全国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又开始走下坡路。而从一九六八年春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及而后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使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仅江苏省以“反许（世友）乱军”〔20〕为罪名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就高达三十万人。依此类推估算，当时由南京军区管辖的苏、浙、皖广大地区，其受害总人数应该远远超过了全国反右运动的受害人总数。

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不过是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21〕，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22〕

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23〕

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24〕

但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五一六”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至此，所谓

“五一六分子”已延伸成为一切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政权的人民群众。1971年2月，“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中共中央2月8日决定，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联合专案组”，在全国大整人民群众。（25）

这一运动按中共中央“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逼供信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尤其是首都地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整成了“五一六分子”。据十分保守的估计，这一运动都迫害了几十万群众，使数万无辜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致死致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26）

通过以上情况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中出现的庞大造反派群体，不过是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悲惨命运在文革历史条件下的重现和扩大。虽然在文革后期，造反派队伍中出现过极少数从极左或极右立场上质疑、挑战中共统治地位的异端思潮，但是就总体而言，造反派基本上是在中共当时既定政治路线的规范和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倾向和思想判断，积极投入参加了文革运动。如果说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个责任显然应该主要由当时的文革发动者和路线制定者来承担。这也是中共处理历次路线错误时所采取的传统正确立场。然而，在中共正式否定了文革及其阶级斗争扩大化路线之后，或许是受五七年和文革初期“反右”历史惯性和传统阶级斗争概念的影响，或许是为了满足某种短暂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跟随党的正统路线最紧、受到政治打击最重的造反派，却受到了又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和否定。这种政治意义含混不清的做法，第一个重大不利后果，就是妨碍了人们对文革灾难的客观审视和真正吸取有益的教训。

长期以来，主张深刻反思总结文革教训的呼声不绝于耳。要求文革参与者进行良心忏悔的呼吁，更是声浪迭起，咄咄逼人。被众多回忆传记和各类文艺作品涂黑的造反派，更成了要为无数文革暴行承担罪责的当然对象和众矢之的。而除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时全国性斗批活动和同年夏天全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之外，在我们以上所提到的三大文革迫害狂潮中，几乎没有哪一笔暴行，应该有造反派来承担罪责。有人在谈到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时这样回忆：

“据我所知，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迫害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暴行主要发生在此期（后期虽有‘清队’，‘一打三反’等残民运动，但规模远逊此期）。因此，有必要对后人讲清谁是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这一点对局外人来说远不是清楚的。尤其自张戎《鸿》一书问世并获得空前成功后，国外读者似乎已将文革中的一切罪行都与毛、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牢牢联结起来，既不知道红卫兵组织的五花八门，更不知刘邓除了被迫害外，还在运动初期扮演过何等角色。其实，凡过来人应该都清楚，造反派如今虽成了文革的替罪羊，与文革中迫害民众的罪行多数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与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实施更无缘份。如上所述，那场暴行的发动者与实施者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以区别于后来的亦自称‘红卫兵’的造反派或保守派）。”（27）

而据本人所知情况和前文提到的事实来看，“二月逆流”时期造反派被大批逮捕入狱甚至被枪杀的遭遇，在六八年“清队”及而后“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中，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群众所遭受的暴行和迫害，也许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加以形容。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致伤人数的高峰，基本发生在这几个时期。而在文革初期犯下种种暴行的“血统论红卫兵”为了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似是而非地指出：文革时期大量死伤人数发生在造反派大打内战的六七年夏“大武斗”时期。为了澄清历史真相，在此有必要对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作出确切的定义。

截止一九六七年一月份，按照文革初期是否受单位领导和文革工作组压制打击或支持扶助，辨别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很容易。在二月份解放军加入地方文革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分，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部分造反派成员在文革初期、反右、“四清”甚至更早时期所受到的压制、歧视和打击，在“一月夺权”时对原保守派骨干成员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报复泄愤行为。虽然无论就本人亲历所观察到的情况看，还是从不少文革作品所描绘的总体情况来看绝少读到在“一月夺权”时期有杀人之类的暴行，造反派的报复行为基本上是让“铁杆老保们”享受“低头、弯腰、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他们在数月前曾经享受过的“待遇”。但是这种狭隘报复泄愤行为，在被批斗党团骨干分子心中所激起的心理反抗和仇视情绪，却非常之强烈！这大概要归结于多年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既得政治经济利益的短暂失落，以及由政治地位突然转换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原来受自己支配、监督和蔑视的“二等公民”，居然爬到头上来拉屎拉尿，这些前保守组织骨干似乎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右派复辟翻天、什么是阶级敌人重新上台的滋味！

在驻军一加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地区（上海、山西、黑龙江、山东等已经受到中央肯定的少数造反派夺权地区也许除外）军管会的门口，就天天拥塞着这些由中共“基本群众”所组成的诉苦控告人众。而那些受冲击保守派驻军家属的抱怨诉苦，对军队决心镇压“翻天右派”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或许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碍于毛泽东“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明确指示，大部分支左部队在对各地造反派实施镇压之时，都成功地分化、瓦解和争取到了一部分“老造反”组织，并且以他们为旗帜和骨干，集合已经被取缔打散的原保守派组织成员，迅速建立起以取代原有造反派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新保守派队伍。

由于这一缘故，在六七年二月份之后，在名义上全国几乎不再存在一个正式打着保守派旗号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组织，都自称为造反派。所有的恶事坏事，都顶着造反派的名义干。这大概就是文革造反派之所以变得臭名昭著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据本人所知，那时候全国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自发成立起来的老造反派组织，例如类似无锡市红总那样属于整个江苏地区的“踢派”，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南的“湘江风雷”，新疆“红二司”，青海“八一八”，武汉“三钢”……，无不遭到“支左”部队“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从表面情况看，靠把原来“老造反派”踩到脚底下而崛起的新“造反派”，虽然在组织上与原来的地方“走资派”彻底划清了界线，“打倒刘、邓、陶”的革命口号，比任何人都喊得响亮；但是一个极其关键性的区别是：他们仍从骨子里，把四、五月份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压力之下得到平反的老造反派，视作终有一天要进行“秋后算帐”的翻天右派。根据这种对造反派所抱的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实际上应把他们称为新保守派更为合适。新保守派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敌情观念，经过文革初期半年多真枪实刀的磨砺，愈加不可改变和动摇。而部分“重振军威”的老造反派对军管当局的敌视、示威、和冲击“炮打”，更坚定了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和要与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有少数地区支左部队确实支持了造反派，但大多数支左当局站到了新保守派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怂恿他们的立场和想法。

为便于认清文革新老保守派的性质，在此不妨援引一下当年湖北激进造反组织的“北、决、扬”所作的有关分析：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28）

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在“二月逆流”之后与保守派合流并充当“左派”旗帜的少数老造反派们，对上述保守派的性质就没有一点认识。问题是，他们不仅已经与支左当局和保守派在政治利益上完全捆在一起，而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代表当时新保守派思想立场的“清华四一四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也许可以用“河归旧道十七年”七个字来加以概括。作为全国各地打着造反派旗号而实质上抱有新保守派观点立场的“四一四思潮”，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

一是“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强调“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29）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30）

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31）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32）因此“四一四思潮”反对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反对“……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33）

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清华四一四派”头头周泉缨曾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应当“收”了。他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

或朝代延长”。〔34〕

从“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上述三大理论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中共官僚阶层惯用的反右斗争政治思维习惯。“四一四思潮”凭借响当当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招牌，却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从整体上，加以根本性的否定；而对十七年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却显露出不加掩饰的留恋和要求重新恢复的渴望。这样一种明确的反文革立场，清楚地反映出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河南造总”、黑龙江“山上派”、湖北“三新”、湖南“学司”、四川“红成”和“八一五”以及北京“四四派”等一小批组织，虽然仍然打着“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已经成了完全皈依保守派政治思想立场的新保守派。

文革造反派显然十分明白新保守派在“造反派”旗号下彻底扫荡造反派的真实意图和最终目标，特别是在看到支左部队用“明抢暗送”方式为新保守派提供现代化武斗装备时，他们更清楚地知道：维护自己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坚决对抗到底。但是，经过粉碎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短暂政治胜利之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灭顶之灾。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一反第十二期那个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著名社论精神，发表了以揭露粉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主调的社论〔35〕，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虽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革以及矛头指向他的那部分观点，然而为了巩固政权并且把造反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毛泽东已和党内官僚阶层代表周恩来联手准备进行一系列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从思想上，他开始按“四一四思潮”所主张的那样，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并且开展了比反右运动更为严酷、更为广泛和更为彻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那些带有“右派翻天”嫌疑和得罪了各地军政要员的造反派骨干分子。

注释：

〔1〕萧关鸿，李逊“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标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

〔2〕胡思之“如何评估毛泽东”，《人民日报》BBS论坛之读书论坛，2000-02-12。

〔3〕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中新社。

〔4〕箫羽“我眼中的文革”，《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2000-01-31。

〔5〕请参见该书第三章：一、1957年的悲剧：罪责与惩罚。二、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天堂与炼狱。

〔6〕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7〕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

〔8〕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9〕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第一章：“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刘著全文刊载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第一辑《封杀不了得历史》。

〔10〕同〔4〕。

〔11〕遇罗文“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跋”。

〔12〕《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四）《华夏文摘》增刊第192期。

〔13〕《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

- (14) 同(2)。
- (15) 遇罗克《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16) 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资本家。
- (17) 刘国凯“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的一章。见(9)。
- (18) “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19) 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三)”。
- (20) 指反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搞乱军队。
- (21)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写作班1970年。
- (23)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 (24) “中央首长痛斥“五一六兵团””，载《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黑兵团》(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1967年)。
- (25)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 (26) 宋永毅、孙大进《文革和它的异端思潮》第五章、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 (27) 《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二)”所载《也谈学生打老师》。
- (2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 (29) “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30) “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31)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谓“五大领袖”时曾明确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于当时周泉缨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 (32) 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
- (33) 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8年9月。
- (34)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35) 《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 (未完待续)

□ 寄自加拿大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钟超(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波(美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 C N D 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